

金球奖首位亚裔影后的摘“金”奇缘

“

十五六岁时，她带着自嘲和青春期迷茫，为自己取了艺名——奥卡菲娜。“我觉得这个名字有趣，里面‘尬’这个词很适合我，因为我这个人尬。”在她看来，奥卡菲娜代表了被她自己压抑着的、与她“安静、更被动”性格相反的另一个自我。她决心做自己，虽然路径还不清晰。

毕竟，人生开挂的最大一种可能，永远是坚持做自己，充分展现命运赋予自己的那一份独特的美丽。

本报记者徐剑梅

她有三个名字：中文名林家珍；英文名诺拉·林；艺名最为人熟知——奥卡菲娜(Akwafina)，前半段拼写取自英语单词awkward，意思是“尴尬的、笨拙的”。

31岁的奥卡菲娜，没受过影视表演训练，参演过4部电影，只有一部担纲女主角。但就凭这一部低成本高票房的中美合拍片《别告诉她》，她获得2020年金球奖电影类音乐/喜剧片最佳女主角，成为金球奖创立75年来首位亚裔影后。

人生“开挂”有N种可能，都需要运气。但有梦的人虽多，运气不见得都肯惠顾。

磨练出“坚硬的皮肤”

奥卡菲娜的长相，不属美艳那一挂。

她有一张典型的东方面孔，一头黑直顺长发，双颊骨骼突出，眼睛细长，一口白牙齿整齐闪亮。她嗓音有些低哑，五官单独看称不上精致，但笑容恣肆张扬，忽然沉静甚至有点忧郁的时候，黑黑的瞳仁里，有一种内心专注带来的力量感。

银幕和很多电视访谈节目里的她，走、坐、站，都有点儿塌肩缩脖。这种仪态，不论男女抑或东西方，似乎都不太符合人们对优雅、教养之类的传统观念。

但偏偏就是这样的面孔、这样的姿势，一块儿搁在她身上，莫名产生了一种独特、辨识度很高的喜感、家常感。

用西化的文法形容：奥卡菲娜具有共情能力。

在《摘金奇缘》(即《超级亚洲富豪》)里，她很夸张；在《别告诉她》里，又很节制。但不管角色如何设定，她给电影院里观众的感觉是放松的。各种微表情不断涌出、转换，丰富而生动，令观众仿佛遇见活生生的邻家女孩，直接触摸到她内心的七情六欲。

这或者是一种天赋。

接受《纽约时报》专访时，她说，她没有学习过表演。有一段时间，导演们心里总想：“没在任何电影里见过她，我为什么要用她？”当然，现在，还有以后，不会再有人问这个问题。

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，她听到自己的名字，站起身，走上台，捧起奖杯。看得出她内心很激动，但语气动作却很克制，头脑一直清醒。她记得感谢所有需要感谢的人，导演、电影中的奶奶，父亲，最后是在她4岁时去世的母亲——她希望妈妈在天上能够看见她的此刻风光。

奥卡菲娜不怯场。

她在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时曾说，她开始音乐生涯时，独自一人在全美各地演出，很多地方没人知道她是谁。有时候，她不得不面对被扔西红柿的情况。这样的经历，让她磨练出“坚硬的皮肤”，“这确实帮了大忙”。

你只能成为你自己

奥卡菲娜生于1988年6月2日，在纽约皇后区长大。曾祖父母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移民美国，是最早在法拉盛唐人街开中餐



▲奥卡菲娜在中美合拍影片《别告诉她》中饰演女主角。（图片来源网络）

馆的华人之一。

她母亲是韩国人，会画画，在她4岁时因肺动脉高压病症去世。她由父亲和祖父母抚养长大，和祖母特别亲近，成名后屡次提到，奶奶经常跟她说要相信自己，坚持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。

她起初的梦想，并不是成为影视明星或者喜剧演员，而是当一名说唱歌手。

潮流网站HYPEBEAST2018年的一篇访谈说，她11岁起就对说唱乐着迷，常和朋友一起在公园里说唱，还买了一台手提式卡带录音机，“配上麦克风，放入空白磁带，便开始录制。”

十五六岁时，她到纽约皇后区一所表演艺术高中念书，吹小号，学古典音乐和爵士乐。她性子急，精力充沛，但不太自信——觉得自己尬，拙，不起眼。

带着自嘲和青春期迷茫，她为自己取了艺名——奥卡菲娜。“我觉得这个名字有趣，里面‘尬’这个词很适合我，因为我这个人尬。”在她看来，奥卡菲娜代表了被她自己压抑着的、与她“安静、更被动”性格相反的另一个自我。

在美媒访谈中，奥卡菲娜说，在这个人生的特殊时期，韩裔美国喜剧演员赵牡丹(Margaret Moran Cho)带给她激励和希望——就在离自己很近的地方，有亚裔女性获得成功，“或许我也能”。

赵牡丹比奥卡菲娜大20岁，以脱口秀出名，也是服装设计师、作家和创作型歌手，参演过电视剧《欲望城市》和电影《变脸》。

奥卡菲娜说，她在赵牡丹身上，看到了在其他亚裔女性身上没有看到的东西——“毫不害臊”(she was so completely unashamed)。她还觉得，赵牡丹有过与她相似的心情，那就是你只能成为你自己，“没有可能变成其他任何人，也不想变成其他任何人”。

高中毕业后，奥卡菲娜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了两年中文。“如果不是为了回来追求自己的说唱梦，也许自己现在还在北京生活，因为我太喜欢那里了！”她在Hypebeast的访谈中说。

重返美国后，她进入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，攻读新闻和女性研究。她花很多时间制作嘻哈伴奏音乐并自己演唱——为了自己制作的伴奏音乐有人唱。

她决心做自己，虽然路径还不清晰。

“我创造了奥卡菲娜”

大学毕业后，奥卡菲娜并没有立即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，

影。没入围奥斯卡，《别告诉她》仍然毋庸置疑是一部好电影。不过，是否好到能成为未来的经典，恐怕见仁见智。

从一个旅居美国的中国人视角，这部电影好在克制和细腻，没有落入俗套的戏剧性冲突。但剧情相对单薄，人物个性也较单一。“奶奶”气质之优雅，与她生活的环境有点格格不入。

影片所聚焦的东西方文化差异——所谓的西方强调个人主义，东方奉行集体主义，其实再俗套不过。但胜在切入角度独特——疾病与死亡带来的恐惧和痛苦，是应该由本人自己独自面对，还是亲人共同隐瞒和帮助承担？

东西方文化里，都有数不清的“白色谎言”。如何面对疾病和死亡，更是人类永恒的挑战。

个人猜想，这部电影之所以吸引美国人，不是因为展现了什么新鲜的文化冲突，而是传统中国人的这种处理方式，扣动了他们的心弦。毕竟，不管文化差异多大，在死亡面前，人人心存恐惧，人人需要勇气，而勇气的重要源泉，是爱与亲情。

影片中，罹患癌症的奶奶，被所有亲人深深地、自我克制地爱着。情感越少形于声色，越令人动容。归根到底，如一位美国电视主持人所言，爱与亲情是超越一切文化藩篱的主题。

奥卡菲娜在接受美媒访谈时说，观众对这部电影的感受，对她而言是一种新经历。在圣丹斯国际电影节上，很多观众看完这部电影几个小时后仍然沉浸其中，“好像控制不了情绪”，令她非常感动。

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，至少在公开场合，奥卡菲娜没有表示失望，而是重申了她对获得关注的感激。

她说，这部电影上映之初，真的不知道它会把她带向何方，“我已经历了一段非常令人兴奋的旅程……我无比感激能做我喜欢做的事，并且得到至少一点点认可。这就够了，这很棒了。”

“生活是一个答案开放的问题”

毋庸置疑，奥卡菲娜已经踏上星途。但她是清醒的，对自己的少数族裔和女性身份有着强烈自觉。

在接受美媒采访时，她说，她会担心如果得不到持续的、适当的支持，好莱坞对多元族裔的包容性会不会减弱。“我总在担心这个，我不知道这(种族包容性)是否是一种趋势。”

“我知道我想要什么，讲述影响人们的故事——讲述好的故事，这是我能掌控的。”奥卡菲娜说。

1月22日，她担任编剧、执行制片人和主演的电视剧《奥卡菲娜是来自皇后区的诺拉》将在美国“喜剧中心”(Comedy Central)有线和卫星电视频道首播。这家电视台已于14日宣布，将续订这部电视剧的第二季。

据介绍，这是一部半传记性质的系列电视剧，很多素材来自奥卡菲娜作为诺拉——一个普普通通的亚裔女孩，在纽约皇后区长大的真实经历。

为创作这部电视剧，她寻找讲述自己在纽约长大经历或者身为亚裔美国人体验的写作者，希望走出典型的好莱坞制作体系，“发现有前途的新声音”。她希望自己能像赵牡丹当年提携籍籍无名的她那样，帮助更多亚裔新人。

“诺拉就是我们很多人在20多岁时发现的自己。之后会怎样？会成功吗？成功会突然搞定所有事情吗？不，生活是一个答案开放的问题，让我们拥有从前想象不到的成长空间。”她在接受《纽约时报》访谈时说。

她说：“我特别关注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真实经历。我觉得诺拉这个角色一点也不夸张……她不必去追求任何不属于她自己的东西。我希望这部电视剧能激励青少年不要害怕做自己。”

她是否考虑在今后的演艺生涯里，回归“诺拉”，放弃奥卡菲娜这个艺名？

答案是：至少现在还不会。

或许，她仍然感到，尽管在美国娱乐圈扎下脚跟，却还是一个需要面对很多族裔和性别偏见的尬女子。

又或许，她仍然感到，自己需要奥卡菲娜这个艺名里的“尬”，来继续张扬个性中被压抑着的自我，激励自己做自己。

毕竟，人生开挂的最大一种可能，永远是坚持做自己，充分展现命运赋予自己的那一份独特的美丽。

为国守护“健康之门”，海关检疫员的职业性“漂流”

三百六十行360

“

外国船不过春节，姚光辉说已接到船舶预告，大年初二会有货轮请求进港查验。“家人也早习惯了，无论什么日子，只要有船来，就要出海工作。”

本报记者张宇琪

从天津新港码头到锚地海域距离约为22海里，往返一趟需5到7个小时。风翻白浪，船只颠簸，这段航程，海关关员刘蕤和姚光辉已走了整整十年。

海关检疫，是阻挡外来疫情进入我国的第一道关卡。他们每年出海往返于锚地和码头80多次，将外来货物潜在生物疫情风险，牢牢挡在国门之外。

海上漂流数小时，守卫国门安全的前哨防线

腊月二十二，年关将近，刘蕤和姚光辉又要出海了。

早晨9点，刘蕤和“老伙计”姚光辉在天津新港码头下车。二人再度检查了随身携带的查验装备，又提上了两双胶靴，登上了拖船。

螺旋桨推开展光中的波涛，白色拖船再一次朝着海岸线22

海里外的锚地驶去。

外国船不过春节，10年800多次的航行当中，总有几次落在过年的当口儿。

天津港锚地海域，距离海岸线约二十几海里，是供船舶在水上抛锚安全停泊、避风防台、等待检验引航及其他作业的水域，也是国门安全的前哨防线。

在这里，刘蕤和姚光辉要对船上运载货物进行外来有害生物的检疫查验，核对船只相关单证资料，确定文件齐全且无疫情风险后方可开具准卸通知书，允许货轮停靠卸货。

每次出海工作，刘蕤和姚光辉的小船总会在海上摇晃数个小时。

海上久航，孤独吗？其实还是有一点的。

船驶离港口不久，海上就没了信号。在刘蕤的记忆里，最初搭班的几年，在海上漂流时，二人还能聊天解闷。如今，话题聊尽，想说点什么，却欲言又止，想起这个话题早已说过了。

于是，两个人经常就站在船头，静静看会儿海。

吐了四年，他的胃才“接受”这份工作

22海里，对姚光辉来说曾是“残酷”的考验。出海乘坐的拖船重量轻，稍有风浪便摇晃颠簸，人极易晕船。

工作前几年，每次出海，船驶出防波堤不久后，他就开始恶心难受，趴在船舷上，连黄绿色的胆汁都吐出来了。吐了四五年，他的胃才终于被迫“接受”了这份工作。

因为晕船，他还发生过一次“险情”。一次出海前，姚光辉吃了两块西瓜。刚出海不久，呕吐如约而至，有人看到了吐出的红色液体，惊慌失色：“坏了！姚师傅吐血了！”

他忙摆摆手说：“没事！这是西瓜！”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大约3个小时后，拖轮速度逐渐放缓，“卡拉特”号高大的船体出现在眼前，船上运载的是来自美国的高粱。刘蕤和姚光辉向船上的海员挥手致意，很快一条长约4米的软梯从船舷边垂了下来。

要完成查验任务，刘蕤和姚光辉必须顺着这条软梯，登上这艘“庞然大物”，这也是他们工作中最惊险的环节之一。货轮和拖轮之间大概半米距离，软梯下面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，看得人心惊胆战。

海面上波浪翻滚，二人需要抓住海浪将拖轮托至顶峰的时机，牢牢抓住软梯，再攀爬登船。这个时机非常重要，波涛起伏瞬息万变，若在拖轮起伏低点登梯，如赶上风浪大，拖船上下起伏的幅度会到两米，一个浪头打来，拖轮被托起，就会挤到正在攀爬的人，发生危险。

汹涌的海浪，漆黑的海底，没有人不害怕，姚光辉也是。他回忆，最惊险的一次是一艘减载的货轮，舱底货物少，吃水浅，软梯高度达到10米以上，约莫三四层楼那么高，爬到最后“手臂都要没力气了”，他只能在心里给自己鼓劲：“千万不要松手！也别往下看！”

登船后，二人先检查货轮清仓证书、熏蒸证书等文件，之后下到货舱，进行熏蒸残留检测和过筛查验。船上有七个货舱，装载了近7万吨高粱。他们要对所有舱中高粱进行表层定点取样查验，看有无霉变、种衣剂、检疫性生物等问题。

成片的高粱好像棕红色的沙漠，瞬间没过了二人小腿。刘蕤和姚光辉像踩在流沙中一般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不断蹲下取样将高粱过筛，站起观察筛留物，如此反复十数次后进入下一个货舱，直至全部查验完成。

货轮5号舱是未满仓，他们要通过“人孔”走楼梯下到近20米的深度进行筛查。下行楼梯周边没有任何防护措施，舱内满是灰尘，楼梯上有残留的高粱，非常容易打滑摔倒。从舱顶看下去，他们取样的身影像是两个小小的黑点。

货舱露天，夏天出透汗，冬天凉透心。查验过后，二人从舱里出来，满头是灰。从货舱四下望去，是无尽汪洋，偶有海鸟从天际飞过，工作之余，刘蕤望着大海，偶尔会恍了神，感叹于海洋的广袤。

每个舱都要仔细查，将疫情传播风险降到最低

这么多散装粮，能查得过来吗？

“能。”刘蕤说，“而且每个舱都要仔细查，将疫情传播风险降到最低。”

辛苦的工作没有辜负他们。2017年，他们从一批来自美国的大豆中截获了多种检疫性有害生物，其中，密刺苍耳为全国口岸首次截获。近三年来，他们共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2837种次。

“密刺苍耳的生长能力极强，如果传入会影响到我国农作物生长，难以治理。我们的工作，就是要将这种高风险有害生物挡在国门外。”刘蕤说。

“当时不知道是全国首次，送到实验室鉴定之后才知道，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。”再度提起那次查验，刘蕤依然笑得开心。“工作虽然辛苦，但是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，尤其是这种首次发现，我就觉得我们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。”

货舱上散装粮全部查验完毕后，已经是两个多小时后，刘蕤和姚光辉又通过软梯返回到拖轮上，准备回程。

回程路上，姚光辉说已接到船舶预告，大年初二会有货轮请求进港查验。“家人也早习惯了，无论什么日子，只要有船来，就要出海工作。”姚光辉说。

暮色四合，码头的轮廓逐渐出现在眼前。刘蕤和姚光辉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双脚踩上大地时，二人疲惫的脸上都露出了放松的表情。

天津港港口背后的城市，华灯初上。(参与采写：梁姊)